

## 目 录 CONTENTS

### 本期专题·中等收入陷阱

- 02 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能绕过去吗
- 08 中国财长楼继伟：中国可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
- 09 郑永年：中国难逃中等收入陷阱

### 政坛经纬

- 11 “官心病”的自我救赎

### 人物长廊

- 14 丘吉尔：理想领袖与悲剧英雄

### 历史深处

- 17 政治漩涡中的写作班子（五）

### 悦读时光

- 封三 苏联的最后一天（二）

**编者按：**近来，关于中国会否以及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又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自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攀升，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话题便一再被人们提及。而相同时段拉美地区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的放缓和政局的动荡，更给这一议题添加了几分紧迫感。

关于一个经济体如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见仁见智。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习近平说，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我们有信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仅从发展阶段上分析，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和发展阶段，中国恰巧进入到人均GDP3000美元以上和1万美元以下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一些国家成功避开中等收入陷阱，欧美自不必说，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许多国家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自今不能自拔，亚洲和南美国家居多。亚洲的菲律宾、泰国，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以及墨西哥等至今仍在“陷阱”里苦苦挣扎。

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

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本刊特此推出“中等收入陷阱”专题，供您决策时参考，其他栏目的文章相信也能引起您阅读的兴趣。

主 办：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臧 科

主 编：刘 进

责 编：周玉奇

地 址：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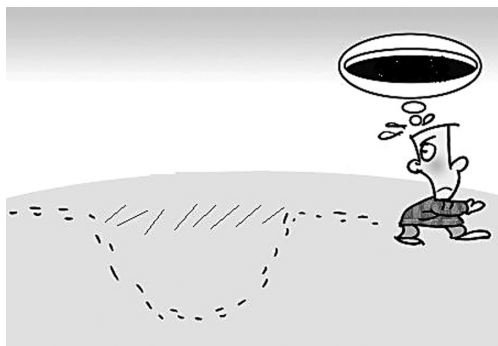
邮 编：224005

电 话：0515-69971581 18961988622

邮 箱：75156450@qq.com

网 址：www.yctsg.cn

设计制作：盐城市圆融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 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能绕过去吗

### 缩小贫富差距才能绕过中等收入陷阱

一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经济体成功对接了全球化带来的制造业转移的历史契机，一跃成为地球上另一个“超级大国”。如今的中国，不论从经济总量、科研能力、基础设施各个方面看，都与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相匹配。

然而，如果我们把“改革”、“开放”仅仅看做是表述一种经济政策取向的中性词，而不是另一种顶礼膜拜的意识形态的话。那么在肯定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发展的过程中过度的追求效率，而忽略公平的价值取向，让中国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时候，贫富差距过度拉大。过度拉大的贫富差距，一方面消解了人们对改革开放的正当性理解，一方面减弱了人对生活水平巨大提升的满足感，同时为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可持续发展设置了障碍。

就中国目前的状况来看，无论按照哪一种测算方法、哪一种统计口径的数字都表明，在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从一个收入相对平均的国家，转变为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严重、其收入差距超过了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这样迅速的变化是让人担忧的。

在过去 30 多年里，从发展轨迹上看，中国基本效仿了日本经济成长模式：高效而强有力的政府主导和推动下经济高速发展。但从国民财富分配的结果上看，却产生了如巴西、墨西哥等国走过的所谓“拉美化”趋势。

二战后，拉美和包括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

亚等东亚国家都曾经经历过经济快速增长阶段，而只有日本、中国台湾、韩国等少许几个经济体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高收入或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大部分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停顿状态。从这些国家的发展过程来看，哪个国家在快速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没有快速拉大，哪个国家就能通过“中等收入陷阱”，反之哪个国家在快速发展阶段贫富差距快速拉大，那么哪个国家必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无一例外。

也就是说，较小的贫富差距是不跌落于“中等收入陷阱”中的前提条件。而中国目前的发展状态恰好处于两者之间。从经济发展的质量来说，更接近于日本、韩国、台湾——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制造能力。但从贫富差距来说更接近于拉美国家和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国家。中国的这一现状决定了，如果中国能够在短期能缩小贫富差距，那么中国在经历一番艰苦的跋涉之后，能够勉强绕过“中等收入陷阱”。而一旦中国错过了眼下的时机，任由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发展，那么中国必将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众多的人口、贫乏的资源、错综复杂的矛盾都将导致中国永远失去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机会。

贫富差距的问题解决不好，改革开放就等于全面失败。这绝非危言耸听。

近几年，由于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导致普通劳动者薪酬上升，从而让贫富分化加大的趋势得以减缓，这恰好是中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怎么反而成为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了呢？

有经济学家指出：“高度的不平等有可能会阻碍增长，因为无法获得信贷的穷人也许不能利用投资机会，也有可能成为政局和社会不稳的根源，阻碍投资和增长。”

更早的年代，卢梭在《论不平等》中说过：“社会经济不平等给予共同体中有些人过分强大地影响法律制定的力量，把共同体分裂成充满敌意的帮派，都不愿意为了整体利益而牺牲小团体利益。”放在 200 多年后的当下中国，这话精准的令人毛骨悚然。

先贤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贫富差距这种经济不平等所引发的严重后果，即通过隐秘手段暴富的群体会干预立法、司法、行政，并结成特殊利益集团，吞噬经济发展的硕果。他还说，巨大的贫富差距将造成公民间的相互仇恨、对公共利益的冷漠。贫富差距是真正民主的障碍。

保护穷人免受富人的暴政是所有政府的最重要的责任，社会一旦出现非常富有和非常贫穷的人，再来做就往往为时已晚。最好的做法是从最开始就防止财富极端不平等的情况出现，通过管理社会保障没有特别贫穷的人。在卢梭看来，缩小贫富差距，进行收入制度改革，是社会免于陷入混乱和无序的重要措施和必要措施。

对中国来说，现在亡羊补牢，的确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在 2003 年之后，中央的政策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缩小贫富差距的走势。一些缩小贫富差距的措施出台，包括农业税的减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医改的推进、保障房的大规模建设等等。但突发的金融危机打乱了这一进程。四万亿巨额投资在缺少监管的环境下迅速投放，一方面抑制了经济的下滑，保证了就业。但巨额投资中的贪腐现象和巨大货币发行推高的资产泡沫，导致财富迅速向富人集中。中央几年来缩小贫富差距的努力几近付之东流。而正是由于“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劳动力供求关系出现逆转，才让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得以稍稍缓解。

**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双管齐下，才能抑制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世界上，印度几乎是一个唯一和中国具有可比

性的国度，人口接近，文明古国。拿中国跟印度比，我们很容易找到优越感。在经济总量、人均 GDP、经济增速、基础设施建设、人均用电量、人均用钢量等几乎所有的经济评价指标中中国都遥遥领先于印度，但只有这一项——基尼系数，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 2009 年印度是 0.368，而中国是 0.47！中国比印度高出 0.1 个百分点。当我看到这个数字时，我以为我看错了。

基尼指数（Gini Coefficient，基尼系数）是指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指数在 0 和 1 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国际上通常把 0.4 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 0.24 到 0.36 之间。基尼指数在 0.20 以下表示绝对平均；0.20—0.30 之间表示比较平均；0.30—0.40 之间表示较为合理；0.40—0.50 之间表示差距较大；0.50 以上说明收入差距悬殊。

根据 2009 年世界银行报告数据，1960 年代，我国基尼系数大约为 0.17~0.18，1980 年代为 0.21~0.27，从 2000 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 0.4 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 年已升至 0.496，2007 年达到 0.48。

世界银行报告同时显示，最高收入的 20% 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 20% 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 10.7 倍，而美国是 8.4 倍，俄罗斯是 4.5 倍，印度是 4.9 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 3.4 倍。

为了缓解公众对于基尼系数过高产生的担忧，著名学者厉以宁教授曾经提出过著名的“加权平均论”。他认为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特色明显，所以中国的基尼系数应该城乡分开计算，再加权平均，这样算出来的数据就要好看的多，基本接近于挪威、瑞典等北欧国家。

这种推论相当于：一个考试不及格的学生，通过对考题类型的分类分析得出自己的加权成绩应该是 85 分，然后向家长交差。

中国的“基尼系数”在 1994 超过了 0.4 的警戒水平后，1998 年达到了 0.456，1999 年达到了

0.457, 2001年达到了0.459。虽然增长速度并不算太快,令人担忧的是一直呈现正增长的态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和重视。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也在于此。

中国社会收入不公平的局面必须得进行改正,要想改正,必须先两个领域入手,一个是坚定不移地进行财税体制改革,通过财税体制向特权阶层开刀,二是加紧构建新型福利社会,减少国人后顾之忧。

当下的中国,主张多元,观点纷乱,只有少数社会共识:一是贪腐横行,二是贫富分化严重。抓住这两个共识,从这里下刀即顺乎民意又有现实的可操作性。相对而言贪腐的原因和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紧密相连,根除难度要高得多。而从缩小贫富差距则可执行度更高。改革税制,尽快征收房产税、遗产税、奢侈消费税,剥夺不法财富和浮财,此为正道。

现在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精英都积极混淆“企业家”与“富人”的本质区别。在制定政策时以保护企业家的名义保护富人。在税收制度上一锅烩,不区分企业税负和个人税负。以保护企业家的名义保护富人在房产投资和奢侈消费上的利益。

其实企业家群体和富人群体,虽然有一部分交叉,但本质上是两类人。那些把财富大都放在厂房、设备、流动资金上在生产中流转的是企业家,那些把财富基本隐匿于房产、奢侈品、理财账户上的才是富人。很多富人的钱不是通过经营企业来获得的,所以必须通过税制设计向富人财富征更多的税,或者逼迫他们把钱进入实体经济领域。税制改革就是要朝着这个方向走。

目前的财税制度,已经基本丧失了税收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财政税收体制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改革,收入分配不公平、房屋价格持续上涨、房地产暴利、农民财产收入过低、资源浪费性使用等一系列问题就会进一步恶化。由此导致巨大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丛生,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

在市场经济运行中,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是一种必然的现象。而税收制度正是利用二次分配纠正一次分配的不公正现象的有力武器。而目前中国的税

收制度基本上没有实现这一目标的功能。由于缺乏完备的个人财富报税和核查手段,个人所得税事实上成为针对工薪阶层的工资税。房产税、遗产税税种也迟迟没有推出。依靠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征收机制,根本无法实现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就更别说对“黑色财富”“灰色财富”的抑制了。

中国收入差距过大现象日益严重,并对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造成越来越大的负面效应。

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它严重地损伤了普遍受益这一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则。其二,它使大量的社会弱势群体成员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使他们对于社会产生某种抵触的心理,严重的甚至会产生反社会的情绪,进而降低社会的稳定程度。其三,它严重挫伤大量社会劳动者的积极性,削弱社会发展的活力。这一切,对社会的正常运转和健康发展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影响。

第一次分配市场失灵,第二次分配政府失灵。失灵的平方造成贫富差别越来越大,并且向更大发展的态势。贫富差别的扩大,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是,消费对经济的贡献从十年前占GDP的60%,下降到2012年的36%,中产阶层的跌落,让三架马车中的辕马变成了一头瘦驴。最终影响的不仅是社会公正,还有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提高劳动者的薪酬是绕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提条件

一个充满讽刺的事实是,如果我们把劳动力当成一个纯粹的初级产品,不给它加上技能、智力、组织管理、生产资料等外在因素给它带来的增值部分,纯劳动力的价格十年来增长缓慢。

全国总工会201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75.2%的职工认为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这些数字可以佐证我上面的判断。

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充满了机会的时代,但它的缺陷是没有给予那些勤劳但老实的人太多改变命运的机会。而这些人占据了人口的最大份额。所以也就不难了解,为什么我们的医保制度、社保制度推行的如此迅速,但内需的增长依然显得如此缓



慢。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大部分会重新进入投资领域，而低收入者的收入才会迅速的转化为消费。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增长缓慢，以消费拉动经济的愿望就永远是一厢情愿。

因此，增加普通劳动者的薪酬性收入，既是一个社会公平的问题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在投资过剩、出口受阻的情况下，除了让国内消费市场真正启动以消化过剩产能别无它法。

因此，中国在经济推进社会保障进程的同时，应该向当年的日本学习，积极推进自己的“国民经济倍增计划”，使普通工薪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尽快能够有比较大幅的增长。

由于金融危机的不期而至，增加劳动者收入的努力在实际执行中被基本放弃。但低劳动成本换来的是产业结构调整 and 内需启动的迟滞。劳动力薪酬收入低带来的问题更加严重。此时，出台中国的“收入倍增计划”已经刻不容缓。

来自官方的正式表态说，在十二五期间，我国要努力实现职工工资增长 15%，这样，就可以在“十二五”期间实现职工工资增长翻番。这算是一个迟来的，被千呼万唤的中国式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人力和社会保障部的领导给出的路径是要以提高企业普通职工工资水平为核心，进一步深化企业工资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扩大工资集体协商覆盖范围，加快建立企业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实现企业职工工资增长不低于企业经济效益增长，企业一线职工工资增长不低于企业平均工资增长。

但人们有理由怀疑，这些设想只能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得到比较好的贯彻。但在外资和民营企业中，人家总要依据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和自己的经济效益来制定员工的工资。你不可能给每家企业都强行制定一个工资增长的百分比。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强行为劳动力定价是一种摧毁生产力、降低效率的最有效途径。所以尽管在我们的规划中明确了非常具体的努力方向，但是真的要实现这样的目标，还是要找合适的工具。

现在看来，最低工资的调整是我们能够找到的唯一工具。将最低工资制度和职工工资增长直接挂

钩，既要求各地最低工资增长速度不低于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明确订立的每年 15% 的目标。这样才能凸显国家在增加职工收入，减小贫富差别，追求社会公正的决心。

#### 美国是怎样绕过中等收入陷阱的

跨入二十世纪，美国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时代，但也正是这个时候，美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收入差距巨大。

历史数据显示，从 1900 年开始到 1929 年这 30 来年中美国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但不平等程度并没有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的气势而得到根本改变。在减轻收入不公的影响方面，美国政府的作为收效甚微。

以 20 世纪 20 年代为例，美国收入最高的 10% 人群拥有超过 43.6% 的国民总收入，而其中收入最高的 1% 人群的财富更是占到国民总收入的 17.3%。

当时的大西洋彼岸，已经在累进税制与建设福利国家领域有了长足的进步。比如说德国，早在 19 世纪 80 年代俾斯麦就引入了养老金、失业保险甚至国民医疗保险等相关体制。到 20 世纪 20 年代，英国也已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国家福利制度，包括国民医疗福利。

而在美国从独立到 20 世纪早期，美国一直依靠关税养活联邦政府，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税源，也就更不要谈建立在税负之上的社会保障体系了。客观上，这种税收政策既使美国企业和富人无税一身轻，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条件，也给欧美工业品进入美国设置了贸易保护壁垒。可以说，从建国开始，贸易保护主义就是美国的基本国策。但高关税在保护了美国工业和垄断企业的同时，却让普通百姓承担高关税带来的高物价，百姓要用比欧洲人高的多的价格来购买来自欧洲的工业品，而企业和富人们却从中不断的得到好处。

从 19 世纪末，一场长达三十年的“进步主义”运动在美国风起云涌，要求向富人开征所得税并降低关税的呼声越来越高。但这种努力遭到保守势力的顽强抵抗，他们祭出美国宪法，并鼓吹向企业和富人征收所得税是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万万要不得。

争论一直持续到 1913 年。之前的 1912 年，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当选美国总统。作为美国历史上学历最高的总统，曾经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哲学博士伍德罗·威尔逊最终促成了关税的降低和所得税在美国的确立。税收改革和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是这位高学历总统所宣扬的“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按照新的关税法案，所有进口商品的平均税率从 37% 降到了 27%。估计由此将使联邦政府每年减少 5000 万美元以上的收入。这个亏空怎么补上呢？10 月 31 日，威尔逊签署了另外一项法案——《所得税法》。法案规定，年收入超过 3000 美元者缴纳所得税，税率在 1% 到 7% 之间。至此，所得税在美国终于获得了名正言顺的地位。

用来说服最高法院修改宪法，承认所得税合理性的理由是：人们从属于自己的财产中拿出一部分来交纳个人所得税最能引起纳税人的“税痛”，最能增强其公民意识，这将使纳税人对税率提高都会极为敏感，并对政府如何使用税收的问题更加关切，因而也只有个人所得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对于宪政民主的转型具有特殊的意义，有助于在私人财产权和国家税收之间构建起宪政性质的联系。个人所得税会加强人们对政府的监督，防止政府对税收的挥霍。这个推论获得了美国人的认可。个人所得税的缴纳和使用成为美国式民主最重要的一部分。

为了让美国人了解税收和民主制度之间的重要关联，美国的中学八年级的历史教学计划中，安排了税收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历史沿革的内容。在高中教学计划中，解释怎样填写简单的纳税申报表，阐述美国税制与政治、经济制度变迁的关系。在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公民学和商务教育等课程中都设有关于税收的知识。

在此后的历史上，税收政策也成为美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基本规律是，共和党上台通常会推行减税政策以刺激经济，民主党上台通常会加大对富人的征税额度以加强社会福利。在税收政策左右的摇摆之间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平衡。里根减税、克林顿增税、小布什减税、奥巴马增税，如此反复。

在所得税刚刚获得合法地位的时候，主要是向富人征收。经过近 100 年的演变，中产阶级成为纳税的主角，而富人则可以通过各种避税手段免除他们应当缴纳的税收，这成为中产阶级的心病，也让不少富人不好意思，以至于连巴菲特这样的大富豪也呼吁，“向我征税”。

同样在中国，当年为调节贫富差距而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定为 800 元人民币，一年下来正好是万元户的收入，至少在表面上起到了调节高收入的效果。但演变到现在，普通工薪族变为税收主体，而很难从真正的富人身上征到足额的税。

虽然开收了所得税，但在 20 世纪 30 年代之前，美国基本上是没有福利、贫民救济、粮票之类的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也根本没有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险计划。直到罗斯福上任，压缩贫富差别的政府政策才开始出现。

罗斯福总统在 1936 年大选前夕的麦迪逊广场花园演讲所说：“（既得利益集团）已开始将合众国政府仅仅视为其自身事务的工具。我们现在知道，金钱集团把持的政府与暴民团伙把持的政府同样危险。”

罗斯福主政后，开始推行新政。其中在收入分配改革中所推行的“大压缩”政策毫不夸张地改变了美国因社会不公平而踏入纳粹深渊的危险。

在“大压缩”政策的主导与实行之下，美国富人与劳工阶层差距的急剧缩小，到 50 年代，美国富人比例严重下降，中产阶级得到充分的壮大，而且美国人民的生活也更有保障，拥有各种新型的福利，如医疗保险和退休金计划。

可以说，正是由于罗斯福政府推行的大压缩政策，与社会保障与促进就业两大举措并举，使得美国摆脱了大萧条的危害，并促使美国成长为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富裕国家。

美国的发展历程绝不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一直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光照耀耀下前进。美国的资本主义是被深刻改造过的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后发的工业化大国，美国的历史对中国的当下具有借鉴意义。

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绕得过去吗？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最早出于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世界银行2006年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提出：在二十世纪后期的工业化浪潮中，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很多国家往往在经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便陷入到经济增长的停滞期。他们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和现代服务业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通俗来讲，“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而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国家，分别在20世纪70年代后均进入过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之后这些国家无一例外的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看不到跳出陷阱的希望。

一旦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在经济快速发展期积累的矛盾将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

对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中等收入陷阱如同一个摆脱不掉的梦魇。在快速发展阶段，几乎每个国家的国民都享受到自己国家“改革开放”的硕果，人人从经济发展中获得好处，但在发展后期，大部分国家都会出现财富向少部分人聚集的现象，这些国家的政府如果不能摆脱利益集团的胁迫，依照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就必然被“马太效应”所左右，必然出现贫富的分化，也就必然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在许多拉美和东南亚国家，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他们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财富过度集中，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同时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宏观经济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稳定性，政府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不平

衡等顽疾难以消除，经济危机频发造成经济大幅波动。每一次波动都成为一次对低收入人群的洗劫，贫富差距也就越来越大。

中国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可以成为少数几个绕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幸运国家，还是如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那样跌入陷阱？

随着人口红利的结束，中国经济的要素成本快速上升，比较优势正在弱化“低工资、低人权、高消耗”的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从中国经济的最强项制造业来说，企业普遍大而不强，没有成长出一批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品牌价值大的企业。企业普遍缺乏核心竞争力，关键技术靠国外，主要占据产业链低端。与此同时，过于倚重投资驱动，环境压力增大。为了追求超高速增长，直接带来了资源透支、产能过剩、排放过量、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也是另外一个大问题。

在社会层面上。社会事业与经济建设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民生改善明显滞后，“国强民不富”、“幸福指数不够高”是居民的普遍感受。同时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拉大。仇官、仇富等情绪普遍，社会矛盾触点密、燃点低，群体性事件增多。

相对乐观的是，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与拉美等一些曾经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完全不同。政治上相对安定，不同阶层之间的裂痕尚未完全撕开，利益集团对政权的全面裹挟尚未形成。同时，人才总量巨大，本土市场巨大。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市场潜力大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仍具备持续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按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的判断，就中国的增长形态而言，落入拉美、东欧一些国家那种“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小，除非出现重大挫折或反复。不过，在中国经济增长“自然回落”以及回落转入新增长期的过程中，将会面临特殊的矛盾和问题。

但在笔者看来，这个结果有点过于乐观。虽然我基本认同中国所具有的优势，但所有的这些优势在于决策者是否清晰的认识到贫富差距的拉大对中

# 中国财长楼继伟： 中国可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 25 日在“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表示，中国在未来的 5 年或 10 年有 50% 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并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太快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引起的。

楼继伟称，现在中国关键的任务是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 6.5-7% 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就要求我国在未来的 5 至 7 年的时间里，做好全方位改革，解决市场中仍然存在的扭曲。

对于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措施，楼部长主要列出以下五个方面的措施：

一是农业改革，减少对粮食的全方位补贴，鼓励农产品进口。楼继伟称中国人总有战争思维，认为一旦发生战争，我国当前大量进口农产品会被阻断，但他认为即便发生战争，也能靠“换草退耕、还湿退耕”来保证农产品库存。因此目前应鼓励农产品进口，才能进一步转移农村的劳动力，弥补制造业、服务业的劳动力短缺，使工资增速低于生产率的增速。

二是户籍改革，要从法律的角度，打破迁户口的障碍，让各地允许租房落户。他说，国务院于 2014 年 7 月颁布的户籍制度改革文件，截至目前为止只有 14 个省市出台了落实方法，但人们最愿意落户的省份却没放开。因此，为了打破劳动力流

动的一些阻力，国家要提供教育、医疗等资源，让转移的人口真正稳定到城市里面去。

三是在劳动关系上，不能像欧美国家，员工以区域或者行业为单位进行联合，与雇主强势地谈判。要让企业和员工个体决定，增加就业的灵活性。

四是土地改革，农村建设用地（分为宅基地、工业用地、集体的经济用地）交一笔钱以后，就能像城镇土地那样流转。在土地交易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征地拆迁，而由农民应自主决定，并和买地的一方谈判，怎么再就业，怎么交社保领社保。

五是在社会保险的问题上，要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以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真正建立“多交多得”的机制。因为 1997 年以前，社保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国企职工没有缴纳养老保险，只有靠划拨国有资本才能解决之前未交部分的亏欠。而目前的社保制度的给付、收缴、投资收益及替代率等比率必须做出相应调整，不然我国将过不去即将到来的快速老龄化。

楼继伟认为，如果完成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关于 2020 年的任务，我国将绕开“中等收入陷阱”，但同时他也提出其中最大的难题是去杠杆化的问题。他提出不能再积累杠杆率了，否则高杠杆爆发之时是无法收拾的。

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之间的关系。对这一现实的理解决定了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步骤。过多的强调先做大蛋糕在说分配蛋糕，有可能错失解决“分蛋糕”问题的最后时机。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就不可

能解决下一步中国经济的拉动问题。一旦中国经济遭遇“硬着陆”，中国将不可避免的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凤凰网 刘戈）



# 郑永年： 中国难逃中等收入陷阱



3月24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应邀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堂做一带一路战略的演讲。郑永年认为，中国目前有能力也有必要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但是落实战略会有很多困难，对此我们的知识储备还不足，政府工作人员在诸如外交、经济、管理、文化等方面的能力还有待提升。

以下是演讲内容摘录：

一路一带大家都知道，是习主席访问中亚，访问印尼的时候提出来的，强调一带，就是丝绸之路，中国到东亚，中东到欧洲这样一个一带。一路，现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海外贸易，早就有了，宋朝非常发达，明朝郑和下西洋非常重要。那么今天当然提出来了，我想是一个不同的时空背景下提出来的。

今天我讲的是有几点看法。

第一点，丝绸之路就是一路一带，中国必须搞。第二，中国有能力搞。第三点，不太好搞。最后一点，我有信心中国能搞好。

首先我讲第一点，中国必须搞，因为很多人，包括国务院的声音也在怀疑，国内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干嘛搞那么大一个规划。我想搞这个的话，有它内部的需求，也有外部的需求。内部的需求就是丝绸之路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战略的有机部分，我们知道中国改革开放，改革是对内改革，开放是对外开放。开放是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开放很重要，早期的开放，中国的开放就是主要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无论是引进技术也好，出口中国商品也好。

现在对中国的经济，促进经济起很大的作用。为什么现在需要新形势的开放，我是觉得中国国内现在的开放，缺乏新经济增长的一些动力。中国现在

是中等收入，人均GDP是7500美金，中等收入经济体。那么中国下一步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提升为高收入经济体。世界银行根据二战以后100多个国家的情况看，只有十几个国家逃避中等收入陷阱。那么这十几个国家里面，大部分国家是资源性国家，资源性国家之外，就是东亚社会，日本，亚洲四小龙。除了这五个经济体，其它就没有了。那么当然我们有信心能够逃避中等收入陷阱，但是我觉得很难，比较难。

日本有它的背景，因为日本是西方的一部分，战后被美国占领，所以西方基本上把整个市场开放了，日本没有花很大的力气就进入西方市场。亚洲四小龙同样也是一样，第一，亚洲四小龙经济体比较小，第二，亚洲四小龙有些方面都是属于西方殖民的，中国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中国现在的国际环境不好，西方对中国搞贸易保护主义，你怎么办？这个需要考虑。中国经济体是现在世界上第二大，13亿人口的一个经济体，能够从中等收入提升到高收入水平，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研究怎么样才能可持续的发展。

如果大家都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话，资本需要迎求更多海外的空间，投资的空间，商品需要寻求很多的市场。中国也需要寻求新的市场，投资的空间，中国的产品需要进入市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从外部的原因看，我觉得有两个，第一个，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是世界经济失衡的结果，世界经济怎么样重新回到平衡？我是觉得要放到中国对世界经济最平衡的大背景下理解。世界经济失衡是每一个主权经济体，经济本身失衡的结果，美国的经济是失衡的，欧洲的经济是失衡的，中国的经济也是失衡的。那么世界经济如果是要重新走向平衡，就需要每一个

国家的经济走向平衡，美国做了什么？美国比欧洲稍微好一点，但是美国主要的还是金融资本，还是华尔街资本主义。美国做的是量化宽松，实际上我是觉得反而是在这个世界经济，越来越失衡。

欧洲也没有能力，它主要是社会投资跟经济投资的失衡，因为它是独立国家，独立国家走不出来。现在像希腊发生的，法国发生的，大家都看到了，我是觉得欧洲的大众民主，一人一票的民主跟它的经济结构，完全是不相配套的。民主本身是个很好的东西，但是一人一票我觉得跟经济结构之间有这样一个大的矛盾。

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有能力改变世界的经济。更重要的是，中国为什么必须做？无论是国际的经济暂停还是中国自己本身的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中国必须走一路一带。十八大以后，基本上中国的外交格局，基本上形成把它称为说两条腿，一个圈，两条腿走路，一条腿跟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第二大腿就是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路一带。核心就是周边国家，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一个重要国家的地缘政治环境，美国的地缘政治非常简单，周边就两个国家，北边是加拿大，南边是墨西哥，这两个地方高度依赖美国的。中国周围几十个国家，非常不好做，所以中国周边的这些东西，怎么能做好，对中国来说非常艰难。其实中国周边的环境在恶化，各方面都在恶化。这就是中国整个丝绸之路的国际大背景。

第二点我想谈一谈，中国有能力，我想现在大家看一看，唯一一个有能力做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可能就是中国，美国没有能力。美国大家说美国重返亚太地区，美国现在看看中东很麻烦，中东的秩序，基本上是美国西方建立起来的，但是美国现在破坏建立起来的秩序，这个非常要命。美国它有三大负担，一个负担就是做世界警察，做世界警察要付钱，第二个负担就是，美国是搞联盟，跟日本，跟菲律宾。第三个负担就是民主。中东这个秩序，本身也是像埃及，也包括以前的伊拉克，它在政治的建议都是跟美国有关系。

美国说我要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中国已经非常担心了，可是我觉得中国过分担心了。美国要重返亚洲，以什么样的东西回到亚洲，能怎么

样的回来？

第二，中国产能过剩，这个非常重要，产能过剩要有出路，国内假设中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西部还有一些空间，基本上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已经不多了。必须找到出路，这跟西方以前一样，需要寻找开拓新的市场，新的投资空间，资本需要投资空间，过剩产能需要新的市场。那么第三点，我是觉得中国有能力做到，就是中国的技术，丝绸之路从传统的贸易投资以外，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那么中国是当今世界一个最具能力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因为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你真的一路一带，除了像新加坡这样少数的国家富裕起来，有钱的国家，富裕国家，其它都是发展中国家，很平均。中国过剩的产能，中国的资本，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都是这些国家所需要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项目不好做，有很多的挑战。丝绸之路现在在国际上的态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既得利益，是反对中国的。既得利益就是美国、日本，这样的既得利益。中国走出去的话，既得利益肯定反对，因为中国作为新得利益，既得利益反对新得利益，我想天经地义，中国习惯也好，不习惯也好，这是事实。

中国的改革开放，基本上走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说是80年代请进来，请进来的情况下，中国给外面的世界不发生冲突，请进来，我把自己的国家开放，把自己的市场开放给国际资本。第二个阶段，中国讲接轨，为了加速咱们接轨，接轨的时候，中国也不能发生冲突，接轨意味着我改变我自己的法律体系，改变我自己的制度体系，跟世界接轨，这个也不发生冲突。从本世纪初开始走出去，走出去就要发生冲突，因为外面多个方面都是既得利益，非洲也好，拉丁美洲也好，东南亚也好，发达的国家，尤其是美国西方，它的利益已经在那儿了，所以你进去肯定发生冲突。

与反对相反的就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是支持的，因为他们需要发展，尤其社会经济发展成果还很低的国家，西方不给他们钱，现在西方的一个问题是，西方的资本也不爽，但是为什么不能去呢？因为像国际货币基金也好，世界银行也好，包括亚行也好，对广

## “官心病”的自我救赎

相比于其他人群，官员对于心理疾病更加讳疾忌医。究其原因，“官心病”主要来自人际压力与工作压力。在官场法则面前，个人的挣扎往往显得苍白无力，而一旦对这些现象提出质疑探究，又恐会被人误读成“意志薄弱”，“思想出了问题”。

许多人往往选择“隐忍不发”，“一扛了之”，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正所谓“心病还需心药治”，勇敢面对内心世界，培育高尚的官格，才是解决之道。

### 对待上级出以公心

四川省直机关党校教授魏敏生认为，长期以来，机关单位对公职人员的评判，主要看上级对下属的认可程度。而这种认可，一方面出于工作显绩，另一方面则出于关系亲疏。

在规则的作用下，官员想要获得认可，除了干

好本职工作，还需努力同上级“心连心”。官场中，“一切以领导满意为标准”，“给领导办私事与办公事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等价值取向也就逐渐形成。

不少人积极奉行着这样的理论，把大量心思花在与领导周旋上，最终令自己身心俱疲。有的搞“接待工作”捞取印象分；有的把“为领导服务”印在单位的水杯上；落马县委书记袁菱曾抢着为前来视察的上级领导拎皮鞋……

不过，也有人却为此而犯愁。在见诸报端的部分干部日记中，不难发现，处理与上级的关系，正是他们最感压力的事情。

“我知道这个决策明明是错的，又必须执行，我怎么能说领导错了呢……真是越想越别扭”；“可能说错一句话一辈子就完蛋了”；“我们这种陪领导的

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有很多的条件。民主啊，自由啊，人权啊，宗教啊，因为西方本身早期发展，从来不讲这些，发展了以后，就开始讲这些东西，但是这些发展中国家就是鸡跟蛋的关系，我没发展，我哪能讲人权，哪能讲自由，西方说这些附加条件，使得很多的资本到不了所需要的发展中国家，所以这些国家是非常支持中国的。

那么中间就是对中国保怀疑态度，保怀疑态度也有两种，就像日本受美国的影响，尤其是美国的压力，像韩国，就是受美国的压力，也不好公开表态，因为美国是它的战略同盟。而一些国家像澳大利亚也是一样，受美国的压力很大。有些国家对中国走出去，像印尼也是一样，对中国到底要做什么，大家不清楚，非常怀疑，抱怀疑态度。当然这个方面，也是跟中国这方面做的不够有关系，中国丝绸之路已经搞一年多了，到底什么方案，什么东西，现在也没说清楚，我们的知识储备不足，人家不了解也不为过。

中国人一方面自信，你只要自己有信心就可以走出去的，没自信你这个钱就用不好，你这个用钱反正用

的不好。很多东南亚小国家，如果是日本韩国有钱，他们尽量不要中国的钱，因为日本人、韩国人他比较做的礼貌一点，中国的话，哪怕一个市长去了，要人家总理接待，这个就不好。因为中国的外交角色太多，国防部、外交部、商务部，地方政府，国有企业，这个行政机构都差不多，谁也不欠谁，稀里糊涂走出去了，在国内必须有一个领导架构。

中国资本 [0.00%] 一方面要摊到海外市场，从海外赚的钱怎么样呢，是中国人民获利呢，这个非常重要，尤其是我们出去的之后国有企业，以前有的国有企业，老总我跑到另外一个国家，我自己是一个公司，把赚的钱就放到我自己的公司，亏损的东西放到国有企业。

这个要像美国，要像西方以及企业组织去怎么样的建立一种像国外的企业税收制度，你必须制作起来，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的知识准备远远不足。我们已经两千五百多个智库了，我说这都是有库没智。要智来引导库，库太多了都没有必要。  
(凤凰财知道)

岗位，压力是常人想不到的。”

这些干部深为困惑，自己不愿曲意逢迎却不知该如何拒绝领导指令，想要追求人格平等却难以做到真正超脱。

为此，魏敏生认为，只有撇清公事私事、公心私心，公职人员才能真正放下心理负担。

他建议，在与上级打交道时应坚持工作讲规矩，私下讲亲情。尤其不要自我矮化，不搞人身依附，让自己成为领导的“保姆”。遇到工作中有不同意见时，还应该适时适度地向上级反映，把在民主生活会上所提的意见变成日常提醒。

领导干部保持健康的心态，对待下级，也同样需要智慧。

首先做个豁达人。在发生利益冲突时不轻易动怒，避免把自己陷于负面情绪。还要多体谅下属，关心下属，赠人玫瑰方可手留余香。

最为重要的，还是做个明白人。官员们要能分辨下属的赞美，哪些是真心话，哪些是人云亦云，哪些又是谄媚阿谀。唯此，才不至于得意忘形，以致遭到意料之外的打击。

### 改变角度思进退

电子科技大学教授李媛长年从事公务员心理疏导，她得出的结论认为，官员最大的工作压力还是关于升迁的烦恼。

在李媛的课堂上，有公务员大倒苦水，称自己30多岁就遇到了职业天花板，没有上升空间，感到十分迷茫，还有人因为升职受阻甚至大病一场。

某机关将要提拔一个办公室主任，结果“群众推举是我，领导推荐是我，公示名单是我，可任命名单不是我”。结果公布后，落选者觉得五雷轰顶，根本无法面对现实，“连朋友的祝贺酒都喝了，你说我咋办？”

魏敏生指出，长期以来的权力崇拜，加之价值权力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导致多数人把“位子”看作是第一重要的为官追求。

山西官员丁雪峰，为争取吕梁市长一职，通过老乡运作升迁，并至少向3名当地煤老板索要上千万元政治献金。但事实证明“德不配位，必有灾殃”，不到两年时间，丁雪峰就栽倒在了岗位上。

还有原河南栾川县委书记张献会，为了升任副

厅级，对所谓北京“很有背景”的捐客有求必应，最终非但被骗巨资，还被拉下了马。

李媛分析，对于升官受阻的官员而言，若不能积极面对，很容易造成心理失衡，从而在情绪上和行为上出现异化。

成都官员戴晓明，在其政治追求落空后，希望用经济来补偿，主动申请到国企任董事长。结果在任期间大肆贪腐，4年时间就受贿上千万元……

李媛认为，若想让仕途进退不至于影响到官员的健康，最核心的方法是“改变看问题的角度”。要知道，这个社会本来就没有完全公平，学会用“阿Q精神”安慰自己也不见得就是坏事。

她常引用张献会的忏悔来引导失落的官员：“如果人们现在问我什么最宝贵、最重要，我的回答是自由、平安！”

### 认清自己的能力价值

《礼记》有言，“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除了正确面对人际和仕途，官员在看待自己时，也需要审慎客观，方能长久保持一颗平和之心。

官员作为精英群体，每走一步都抱着“只能赢不能输”的包袱。他们既想拥有出彩表现，又怕出现纰漏闪失，最在意被领导批评、被同事抓住“把柄”。

于是，部分公务员在工作上总是显得畏首畏尾，放不开手脚，有点子有想法往往憋在心里，无法付诸实施，当然也就难以获得肯定。长此以往，他们会形成“怀才不遇”、自我否定等不良暗示。

魏敏生认为，只要是干工作，就没有尽善尽美的事情。公务员应该卸下“想赢怕输”的思想包袱，遵从自己的真实想法，勇于表现自己。

另一方面，领导干部也需要认真评价自己的能力、价值，这对其身心健康同样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例如，在类似“金字塔”结构的官场，能够身居高处的人少之又少。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许多人对于更进一步“饥不择食”。他们只看重岗位级别而不论自己是否胜任，常常导致角色超载。

魏敏生表示，官员理性“择业”非常重要，倘若发生角色超载，其遇到挫折的可能性将会大大提高，无形中给自己徒增烦恼。

又如，有官员会认为自己工作太稳定，缺乏激



情，没有成就感，从而对生活提不起兴趣，他们当属未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价值。

“出了心理问题，最直接有效的办法还是进行自我调适。”李媛介绍，“心理学不改变外界，只改变内心。帮干部们在官场现实中调整心态，合理化处境，让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尽力，这样就会心安无愧。”

李媛与魏敏生都不约而同建议，公职人员的生活注意力应该有所转移，不要为工作所奴役，可培育兴趣爱好，以化解职务带来的压力。

众所周知，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会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投入业余爱好，毛泽东爱游泳，邓小平打桥牌，江泽民喜欢音乐和京剧，胡锦涛擅长乒乓球和跳舞。

习近平也曾向公众透露自己的广泛兴趣——阅读、看电影、旅游、散步、足球等。

不过，专家同样提醒，官员所好也应积极健康，同时也要适度，防止“玩物丧志”，否则将过犹不及。

中科院心理所国家公务员心理与行为研究中心的副主任祝卓宏认为，“解决中国公务员心理健康问题的方法一定不能只靠心理学，也不能等到有了问题之后再去治心病。我们讲，治病是下医做的事，治人是中医做的事，而大医要治国。”

#### ◇ 保护公务员，我们可以做什么？

关爱公务员心理健康，不仅要靠个人调适，还需要上级领导、组织部门、社会舆论等全面支持。根本上讲，只有建立起健康的组织文化和制度环境，才能真正“釜底抽薪”，否则就只是“治标不治本”。

宋腊梅（深圳市委党校副教授）：“干部压力除了工作本身及‘发展’压力外，还来自于‘官场潜规则’及中国特色的人际关系。”

干部开展工作，除了考虑对事，还要考虑对人。不少官员时常抱怨，人际关系带来的压力甚至超过工作本身。需要澄清政治生态，培育良好从政环境，让干部心宽。

陈耀光（广东省人大代表、省国土厅厅长）：“不干就不会错，要鼓励干的话，就要说公道话。”

还有一种现象，是“干的不如看的”。公务员干得再多，只要犯错就会受到处分，甚至会被摘掉“乌纱帽”，这只能让公务员畏首畏尾，裹足不前。要想让公务员摒弃“前怕狼后怕虎”的想法，上级就必须为敢于“吃螃蟹”的公务员保驾护航，但凡非故

意所致的工作疏忽，就该多勉励打气，少动怒责难。

甘露春（广东中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绝大多数单位对干部心理问题的认知尚处于初级阶段。对已经存在问题的干部，大部分还在按“思想问题”的方法进行处理。

组织部门要正视“心理疾病”的危害性。除了重大灾难、特殊情况后进行的心理干预外，更应注重干部日常的心理健康，建立一套长效健全的激励、关心、帮扶机制。如定期组织心理体检、举办心理卫生讲座、平时开设心理热线或单独谈心进行心理辅导，帮助经受挫折以及面临进退流转的公务员疏导和缓解心理压力。

江曾培（上海市政协委员）：进入官场的人，在职位上多希望能不断升迁，一旦升迁规则不明晰不公正，未被提拔的人就会感受“不公”而情绪低落，容易出现心理问题。

对于因组织原因未获提拔的官员，可适当进行情感补偿。如早年间有一名正处级官员，兢兢业业，有望提拔为副厅级，但一时间位子不够，等到腾出岗位时，该官员又因年龄原因失去了资格。为此，组织对其进行“安抚”，解决了其后顾之忧。

魏敏生（四川省直机关党校教授）：要纠正不良的官场生态，以清廉的政治环境保护官员的心理不受污染，也不遭受不公平的待遇、不应有的排挤和打压，以免“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发生。

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组到各地区、各部门单位展开巡视，明确指出了存在的“圈子文化”“官商勾结”“权权交易”等问题，这些都属于政治生态范畴。各地应对这些问题逐一整改，还要举一反三，建章立制，从源头上杜绝。

杨琳（媒体人）：受腐败官员的影响，公务员群体逐渐被“异化”，普通公务员被贴上“官员”的标签、戴上“腐败”的脸谱，稍有抱怨就被斥为“矫情”，每次吐槽就被骂“不知足”。

公众和舆论对公职人员加强监督，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但不客观、非理性的舆论甚至语言暴力，同样扩大了打击面，给公务员群体带来了巨大压力。对于体制内出现的一些问题，社会应理性对待，特别应该宽容理解公务员工资上调、带薪休假制度等福利的落实。

（廉政瞭望 曾晖）



## 丘吉尔：理想领袖与悲剧英雄

### ◇ 被漠视的预言家

丘吉尔作为政治家的所有伟大与荣耀，都是来自二战，他拯救了濒临战败的英国，而战争成就了他的伟大。

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自动忽略那个 1900 ~ 1940 年期间的政治家丘吉尔，虽然他多次当选议员，做了头衔不同的内阁大臣（殖民事务、商务、内政、海军、军需、陆军、空军、财政），但对当时的他最恰当的评语可能还是“平庸”。

请原谅，我竟然遗漏了丘吉尔在二战前的一大闪光点——预言家。在二战前那个绥靖主义盛行的年代，丘吉尔几乎是英国政坛唯一始终大声疾呼警惕希特勒、反对裁军的异见分子。

很不幸的是，二战前的英国完全沉迷于首相张伯伦的浪漫和平主义之中。当 1938 年 9 月张伯伦和希特勒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得意扬扬地高喊着“我带来了整整一代人的和平”回国时，丘吉尔却在议会公开宣称“一切都结束了”，“不要以为这就是结局，这仅仅是算账的开始”。

自然，一年后二战的爆发完全证明了丘吉尔的预见。如果二战没有爆发，对于英国和全世界固然是大幸，但丘吉尔就会丧失可能是成就他伟大的唯一机会。或者这么说，英国历史上至多会多一位有“先见之明”的政治预言家丘吉尔，而世界历史上会少了一位“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人”（2002 年 BBC 票选结果）。

### ◇ 政治家可以怎样伟大

谈论大政治家丘吉尔，必须回到二战。在我看

来，丘吉尔在战争中的政治贡献主要有三点。

第一点，在战争的逆境中，丘吉尔显示出了近乎非理性的胜利信心和不屈的战斗意志。

丘吉尔是在 1940 年 5 月 10 日傍晚成为英国首相的。他从前任张伯伦手上接过的的是一个面临崩盘的烂摊子，从空中、陆地到海洋，大英帝国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连续挫败。丘吉尔上任后仅仅一周，德军就攻破了法国的战争图腾马其诺防线，法国战败已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风险。

上任后，丘吉尔很快就在下院发表了那次著名的演说，大大鼓励了沉浸于失败情绪当中的议员老爷们，“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奉献给大家”。演说的关键词是“战斗”和“胜利”，前者针对国内与希特勒媾和的声音，后者针对的是失败主义者。“你们会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只能回答：我们的政策是努力战斗，在海上、陆地上、空中，尽展上帝所赋予我们的全部力量，与一个有史以来从未见过的残酷暴君战斗，这便是我们的政策。你们会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能够用一个词来回答你们，这就是——胜利”。

战局的发展很快就证明了丘吉尔的“大话连篇”。仅仅两周后，也就是 5 月底，英法联军已经全面溃败，被德军包围在敦刻尔克。

上帝再次庇佑了英国人。尽管英军从敦刻尔克成功撤退，但实际上他们将所有的重武器都扔在了那里，英国正面临被德国全面入侵的风险。丘吉尔此时的乐观再次令人瞠目结舌。当英国国家美术馆馆长建议把最贵重的藏品送往加拿大时，丘吉尔真

诚地回答：“一件都不用送走，我们会打败他们的。”

从各种资料来看，丘吉尔在二战初期的信心并不能简单归结为“鼓舞士气”那么简单，更准确的描述是，他是真的相信英国会迎来最后的胜利，哪怕眼前的战局令人绝望。

无论如何，英国人被这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深深打动了，即使天空中布满了德国空军的“黑十字”。当丘吉尔视察一个有数十人丧生的防空洞废墟时，幸存者和死者家属几乎将他淹没，他们迅速将悲伤抛之脑后，大声向丘吉尔喊道：“我们知道你会来的，我们能经受得住德国佬的轰炸，并狠狠地回击他们！”

丘吉尔的信心显然比德国空军的所有炸弹加起来还要充足。他发表了无数令人难忘的胜利宣言，比如，“我相信我们会取得胜利，就像相信太阳明天会升起一样”，“按照现在的轰炸速度，德国人大约要花10年时间才能毁掉伦敦，不过在10年结束之前，会有很多事情发生在希特勒先生和纳粹政权身上”。后来的历史证明，希特勒竟然真被丘吉尔“咒死了”。

希特勒可能至死都无法明白，为什么法国人投降了，大半个欧洲都臣服于第三帝国了，但英国人仍然孤军奋战，在看似绝无希望获胜的战局下，一次次拒绝了他“宽宏大量”的“谈判呼吁”。

答案其实很简单，他碰上的是丘吉尔，一个看似忽略一切现实条件的死硬乐观派。可以将蒋百里先生的那句抗日名言送给丘吉尔先生：“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

很快，丘吉尔就惊喜地发现，英国终于不是孤军奋战了。

此时也就顺势进入第二点了，当德国入侵苏联之后，丘吉尔迅速抛弃了自己的反共立场，一手组建了“抗德统一战线”。

1941年6月22日上午8点，当丘吉尔得知德军入侵苏联之后，他的第一句话是：“告诉BBC，今晚我要发表广播讲话。”

“在过去的25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想收回我说过话。”

但是，这一切，在正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情景的对照之下，都已黯然失色了”，丘吉尔在这次著名演讲中一开始就表达了他“不念旧恶”的决心，誓言一致抗德。“俄国的危险就是我国的危险，就是美国的危险；俄国人民为保卫家园而战的事业就是世界各地自由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事业”，“我们将尽力给俄国和俄国人民提供一切援助。我们将呼吁世界各地的朋友和盟友采取同样的方针，并且同我们一样，忠诚不渝地推行到底”。

如果说此时的斯大林还在将信将疑的话，第二天，他就听到了一则让他打消疑虑的好消息：6月23日，为了尽可能减轻苏联前线的压力，丘吉尔下令英国空军对法国北部的德军军事目标实施一系列密集轰炸。几天后，丘吉尔又给斯大林送上了一份大礼：英国情报人员破译的德军东线战场情报。

尽管丘吉尔在内心中并未摒弃他对苏联的仇恨（这可以在几年后的“铁幕演说”中看出），但他此时对苏联的种种援助无疑是真诚有力的。在苏联抵抗德国最危急的时刻，丘吉尔派出的船队冒着种种危险通过北极航道向苏联的军港输送了一船船救命的战备物资。

如果说苏联的参战让英国摆脱了孤军奋战的危局，那么，仅仅几个月后，丘吉尔将迎来他盼望已久的战争盟友——美国。

这也就进入了第三点，丘吉尔在二战中一以贯之的国策：尽一切力量争取美国的援助。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丘吉尔在知道美国遇袭的消息之后，毫不掩饰他如愿以偿的满足感。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回忆，当时他就断言“我们终于赢得了这场战争”，“希特勒的命运已经决定了，墨索里尼的命运已经决定了，至于日本人，他们将要粉身碎骨”，剩下的事情不过就是“把占压倒性优势的力量予以适当的运用罢了”。

“珍珠港事件”爆发两周之后，丘吉尔来到华盛顿会晤罗斯福。在那里，他获得了罗斯福“先欧后亚”的承诺，美国的资源将首先用于解决德国。

从那时起，孤胆英雄丘吉尔就变成了罗斯福身边的配角。丘吉尔清楚地知道，为了战争的胜利，他必须收敛“日不落帝国”首相的高傲，向新贵盟友俯首称臣。

我想，这也正是丘吉尔的伟大之处。

1955年4月，丘吉尔在主持他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时，给他的同僚们留下最后一条建议：“不要和美国人分开。”

直到今天，英国的政治家们依然遵循着这条政治箴言。

#### ◇ 三流的军事家

是的，丘吉尔带领英国打赢了一度陷入必败之局的那场战争，但或许丘吉尔本人都不愿意承认的是，是他在政治上的卓越领导能力帮助他打赢了战争，而不是他那糟糕的军事指挥能力。刻薄一点说，后者添的乱没有改变战争大势，就谢天谢地了。

一战中，丘吉尔任英国的海军大臣，但他这一段经历最让世人所铭记的是，他的坚持导致英国在奥斯曼帝国的达达尼尔海峡陷入了一场可怕的消耗战。在加里波利战役中，协约国军队损失数十万兵力，是一战中英军最为屈辱的几场败仗之一。结果是，丘吉尔被免职，而他的对手凯末尔则因此成为土耳其的民族英雄。

他从不厌其烦地推销着自己的战争哲学：应该躲在战壕中消灭敌人，不要将宝贵的兵力耗费在进攻战之中。二战爆发之初，丘吉尔就被迅速“打脸”，他的战争哲学和法国人的马其诺防线一块儿被德国人的闪电战碾压得粉碎。

在军事上，丘吉尔的“天才”和希特勒高度一致：酷爱跳过正常的军事决策程序直接向前线发报，而且惯用“死守”“战至最后一弹最后一人”等措辞来指挥前线战事。从北非到东南亚，处处可以见到这位“天才军事领袖”的语录飞过。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英军很多明明可以提前突围的战事因此变成了被包围全歼的惨败。

丘吉尔作为军事家的巨大幸运是，他后来碰到了不太听他话的蒙哥马利，同时，他有着“无穷”的美国弹药和装备可以用来“射击”。更大的幸运

在于，英国竟然顶住了丘吉尔的“负能量”打赢了，否则他会像希特勒一样背负着无数乱指挥的段子被后世嘲笑。

#### ◇ 过时的帝国主义者

1940年6月，丘吉尔在一次演说中激励英国民众：“让我们勇敢地承担我们的责任，以便在大英帝国存在一千年之后，后世可以说：‘这是先辈们最光辉的时刻。’”

丘吉尔当时肯定无法想到，短短二三十年之后，这个幻想中的“千年帝国”就成了历史的尘埃。大英帝国明明打赢了二战，却输掉了帝国。

从青年时代开始，丘吉尔就是一个狂热的帝国主义者，对于丘吉尔而言最大的悲剧是，这样一个有着雄才大略的伟大政治家，这样一个经典意义上的帝国主义者，竟然眼睁睁看着大英帝国在他眼前土崩瓦解，而他却只能束手无策地在一旁见证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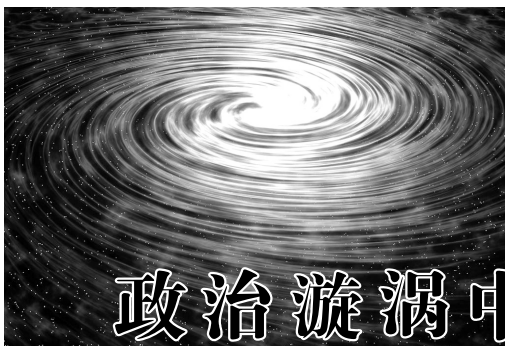
或许可以这么说，当丘吉尔决定要同德国死磕之时，大英帝国的命运就已注定。为了与强敌作战，丘吉尔基本上卖空了帝国，将所有的黄金储备都交给了美国换取武器装备。一个丧失了经济实力的国家还能奢谈什么帝国呢？

更何况，丘吉尔所选定的盟友美国偏偏是英式帝国主义的天敌。罗斯福曾讽刺说“英国人会将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土地据为己有，哪怕是一块石头或一颗沙粒”，其中的鄙夷之意跃然纸上。有一次，罗斯福逼迫丘吉尔将香港归还中国，甚至还鲁莽地提出了印度问题，从而引起了丘吉尔的大爆发，后者反击说应该派一支监察队到美国南部调查一下。

“四五十个国家对大英帝国的存在指手画脚……在我们全力奋战之后……我不认为应该把大英帝国推到被告席上，接受所有人的审判。”丘吉尔一再强调“别插手大英帝国”，1942年11月他还暴怒地声称，他担任英国首相不是为了“负责大英帝国的清算”。但在美国的强势主导之下，他也只能愤愤不平地承认，“大英帝国正被排挤出局，或者说被排挤到了悬崖边缘”。

如果都是“国外敌对势力”也就罢了，最让丘吉尔失望的是，饱尝战争之苦的英国民众也不想再





## 政治漩涡中的写作班子 (五)

吴中杰

(接上期)

当时不但不容许不同意见者进行自由平等的讨论，而且还要设局，以开座谈会的名义，要周子同、周谷城、李平心这些老专家谈体会、提意见，当他们在发言中终于透露出一些对姚文这种乱联系方式的不满意时，当局立即将座谈会纪要在报纸上发表出来，以供批判之用，还洋洋得意地说：终于钓出了大鱼。

但当权力者正集中精力对这些被钓出来的大鱼进行宰割时，却想不到群众中冒出了一个普遍的疑问：为什么海瑞这样的清官要受批判，难道贪官比清官好？中国老百姓一向缺乏人民自己作主的思想，总希望有个清官大老爷来为民作主，所以清官

戏如包公戏和海瑞戏就很受欢迎。现在要批判海瑞精神，这如何向老百姓解释呢？办法总是有的。罗思鼎之流就写文章说，贪官是腐蚀反动统治的基础的，而清官则是用自己的力量加强了封建主义的统治，所以清官的危害性更大，更应该受到批判。这种歪理当然无法说服人，但他们原就不在乎能否将人说服，他们用的方法是：压服。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谁也不敢多加质问了。

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写作班子的文章不但在理论上强词夺理，经不起反驳，而且在材料上也常常弄虚作假，经不起核实。我在“文革”结束之后批判“四人帮”时，曾经核对过石一歌所引用的鲁迅文字，发现胡编乱造、曲解原意者甚多，当时曾

为帝国的存亡付出任何代价了。

从更广阔的意义上来说，在对德胜利后不久，丘吉尔惨败于大选即是拜大英帝国所赐。逻辑也很简单，英国民众迷恋于工党候选人艾德礼所承诺的那个福利社会，而建设福利社会必然意味着削减军费、刀枪入库，维持大英帝国在经济上已经丧失了可能性。相应地，英国民众对于丘吉尔所向往的那个“帝国迷梦”已然失去了兴趣和信心，经济的窘迫让英国普通人无力再去负担这个昂贵的梦。

帝国主义者丘吉尔是伟大的，他为大英帝国保住了最后的荣耀。尼尔·弗格森在《帝国》一书中

对此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在取悦还是反抗历史上最邪恶帝国的问题上，大英帝国作出了正确的选择，“甚至是丘吉尔这样顽固的帝国主义者，当希特勒提出让大英帝国与纳粹化的欧洲一起生存的肮脏交易后，丘吉尔很快拒绝了这一提议”。

为了阻止德意日三国法西斯建立他们的邪恶帝国，选择战斗的丘吉尔带领英国人民放弃了自己的帝国。这难道不是大英帝国“最辉煌的时期”吗？这难道不是帝国主义者丘吉尔送给大英帝国最好的礼物吗？

(《看天下》作者：张明扬)

撰写《帮闲·帮忙·帮凶——还石一歌庐山真面目》一文（载《鲁迅研究集刊》第1期）加以揭露，将他们的编造方法归纳为五种：一曰断章取义，二曰移花接木，三曰无中生有，四曰颠倒黑白，五曰混淆是非。现摘录两种如下：

一曰：断章取义。鲁迅运用唯物辩证法，对事物作一分为二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见解；石一歌则取其一端，按“四人帮”的意思乱加发挥，却背离了鲁迅的原意。比如，鲁迅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致曹聚仁信中论及师生关系时说：“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这里，鲁迅讲的是两点论，既反对封建的师道尊严，也反对学生乘机下石，而重点是在后者。因为鲁迅的话是针对着当时有些青年“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而发的。他还举自己与章太炎的关系为例，说：“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全面地宣传鲁迅这一思想，在今天是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的，但石一歌却不肯这样做，他们仅仅摘取“师如荒谬，不妨叛之”几个字，任意发挥，片面强调学生对教师的“造反精神”，而绝口不提尊师“执礼”的一面。（见《打掉毒害小儿的药饵》）

四曰：颠倒黑白。有些问题，“四人帮”和鲁迅都作过论述，但观点截然相反。这岂不苦煞石一歌哉！不，石一歌自有妙法在。他竟然可以把鲁迅所反对的话，当作鲁迅自己的话来加以引用，黑白完全颠倒了。比如，“四人帮”要搞愚民政策，反对读书，反对学习理论，而片面强调实践的作用，完全违背了毛主席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观点。针对这种情况，周总理于一九七二年作了关于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指示，周培源同志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写了《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四人帮”对此恨之入骨，以《文汇报》为基地，发动了对周培源同志的围攻；打着“群众的社

会实践”的幌子，攻击敬爱的周总理。石一歌的《在屠刀威胁下的演讲》就是参加这场围攻的文章之一。石一歌为了给“四人帮”的谬论找根据，以介绍鲁迅的《读书杂谈》为名，说什么“在这次演讲里，鲁迅就着重地论述了实践的重要性，指出‘阅读’和‘思索’如果不和实践结合起来就会流于‘空想’”，同时引用了这样一句据说是鲁迅原话作为佐证：“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但一查对原文，不对了。鲁迅在这次演讲里，着重谈的是读书问题，而不是实践的重要性，只是在末了指出：“但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更妙的是，上面所说的那段用来作证的引文，根本不是鲁迅的话，而是鲁迅转述的萧伯纳的话。萧称这种“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的人为“观察者”，认为他比“读书者”和“思索者”都好。鲁迅则认为萧的所说，“立论也不免有些偏颇的”，所以接着就加以批评道：“我以为假如从广东乡下找一个没有历练的人，叫他从上海到北京或者什么地方，然后问他观察所得，那恐怕是很有限的，因为他没有练习过观察力。”这样，鲁迅在这里并非如石一歌所说：“指出‘阅读’和‘思索’如果不和实践结合起来就会流于‘空想’”，倒是指出：“所以要观察，还是先要经过思索和读书。”

一个专业写作班子，为什么在资料的运用上会出现这种混乱现象呢？这就是根据“战斗任务”来写作的结果。本来，观点应该是在阅读和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写作班子的写作，从“写什么”到“怎么写”，都是出于权力者的指令，他们所要做的，只是寻找相应的材料来附会这个指令而已。为了宣传工作的需要，难免就要走到改造和编造材料的地步。如果对这种写作方法本身的错误缺乏足够的认识，那么，即使写作内容改变了，也同样会重蹈覆辙。当然，这种根据“战斗任务”来写作的做法，也不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写作班子开始，可以说自从将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当作政治宣传工具以来就有的。何其芳曾经是这种写作方式的佼佼者，他除了接受写批判文章的任务（如批判胡风）

之外，还接受过许多写总结文章的任务，所以有许多学术讨论，都是由他出面总结的，如：可否写小资产阶级问题的讨论、《琵琶记》讨论、李煜词讨论、《儒林外史》讨论、关于文学史编写问题的讨论等，他那篇论《红楼梦》的长文，也是在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之后展开《红楼梦》讨论时所写，不知算不算总结性文章？这种做法很引起治学谨严的教授们的不满，有一位北大教授就公开批评他是“总结专家”。何其芳本人当然不会承认这一点，但他对自己的写作方式也是深有忧虑。他在《文学艺术的春天》序中说：

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论文应该是经常研究的成果，正如创作应该是生活的积累的产物一样。还是在写《西苑集》里面的那些文章的时候，我就向一位年长的同志诉说过我的苦恼。我说，我是在有了写文章的任务以后，才去阅读一些有关材料，而时间又总是很匆促，这样是很难写出可以令人满意的文章的。他笑着回答，像是安慰我又像有所嘲讽：“你这比写文章之前什么材料也不看还是好一些。”有时候是难免有一些我们平时并无研究的问题需要我们去发表意见的。在这种情况下似乎也只有临时占有材料，临时进行短促的研究。在基础和准备较好的人，可能还是可以胜任愉快地完成任务的。但在我，既缺乏理论的修养，又对文学的历史和现状都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依靠这种临阵磨枪的办法就很难对复杂的问题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提出比较重要的创见，而且有些本来可以避免的缺点和错误也就难于避免了。但何其芳因这种忧虑，却使他从批判者而变成被批判的对象。姚文元就以何其芳为靶子，讽刺那些关在高墙深院里的院士们，而称自己这种到处抡棍子的人为“战士”，所谓“不做院士，要做战士”的说法，就是由此而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写作班子，就是沿着姚文元式的“战士”这条路子发展出来的。当时不但以“战士”要求写作班子，而且也以此来要求一切青年学子。复旦大学中文系在“文革”前夕就提出过培养“战士”的要求，并设计了“以战斗任务带

动教学”的一套方法。我曾经傻乎乎地提问：“不看原始资料，怎么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答曰：“我们只要跟着姚文元同志写配合文章就好了，用不到提出什么问题。”

关于学术写作中材料与观点的关系问题，在“反右运动”之后的红专关系大辩论中就有过讨论。当时的论题是：“以论带史”还是“论从史出”？“以论带史”是说要以马列主义的观点去研究历史、解释历史，“论从史出”则是说理论观点要从大量史料中归纳出来。从认识论的规律看，当然是先有事实（材料）后有观点，“论从史出”是对的，但当时正在批判知识分子的白专道路，挟“反右斗争”所取得的政治思想战线上胜利之余威，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改造他们的业务观点，所以“以论带史”说必然胜出。但是，“以论带史”的结果，却造成了普遍的贴标签现象，历史研究、文学研究甚至经济研究都变成寻找一些符合既成观点的材料去证明马列理论的正确。大跃进时期学生们能在极短时期内写出自己所没有学习过的课程教材，就与这种写作方法有关。而这种方法一旦形成，整个社会的学术风气就改变了。写作班子又把这种风气推到极端，他们所根据的已不是马列的理论观点，而是上峰的权力意志。而这种写作方式如果不加改变，单是去追究某篇文章的影射责任，那整个学风还是改变不过来的。

“文革”期间，这种写作班子的写作方式，不但用之于评论文章，而且还扩大到文艺创作。这可以从上海市委写作组所创办的文艺刊物《朝霞》的编辑方针和组稿方法中看出。据《朝霞》编辑部负责人燕平说：什么是《朝霞》的办刊方针？“以我的感受，主要有两点：一是培养队伍。……其目的是要培养一支能为他们那条政治路线服务的笔杆子。二是要触及时事，为政治服务。”燕平还谈到《朝霞》一九七四年第四期上《一篇揭矛盾的报告》的采访和创作过程。他说：这篇作品的题材和主题，都是上海写作班负责人朱永嘉在《朝霞》举办的第四期创作学习班上提出来的。他先是介绍了上

海一家生产电珠的小厂,顶住了上级重视利润的压力,生产出了彩色电视机所用的显象管的故事,说“这是个小厂办大事,反对利润挂帅的好题材”。于是,编辑部组织了三位作者下厂,“围绕着反对利润挂帅这个主题,收集素材”。因为“这些稿子从概念出发,见物不见人,基础实在太差”,为此编辑部失去了信心,决定放弃。但“朱永嘉知道这个情况后,认为电珠五厂的题材好,对重大题材不关心,就是缺乏政治头脑。因此坚持说,还得抓这篇稿子”,于是编辑部决定充实力量,再次深入采访。在这次采访中,听到了一个“蜗牛事件”,说是四机部有个代表团去美国参观一家电视公司,回国时该公司老板给每个代表团成员送了一只玻璃蜗牛,他们带回来了,有个青年技术员知道后就写信给江青,告发他们崇洋媚外,说这是美国人在讽刺我们是爬行主义,江青看信之后非常光火。根据这一件事,《朝霞》编辑部马上决定:“这篇作品不要局限于小厂办大事,重点应该放在批判崇洋媚外上。”这样,一篇紧跟江青思想的作品就写成了,而且还获得了褒奖。“作品发表后,编辑部听到一片赞扬声,写作组领导也认为它及时配合了当前形势,斗争性强,并以杜华章(按:“读华章”的谐音)为笔名,写了一篇赞扬的评论,在《朝霞》第七期上刊出。”(《我在〈朝霞〉杂志工作的回忆》)

“文革”过来人都知道,“玻璃蜗牛”事件在当时所产生的政治影响。为配合此事所写的作品,在“文革”结束之后,难免要被当作阴谋文艺来清算,并要追查制作者与“四人帮”的关系。但从文艺创作的角度看,我认为倒应该检讨一下它的创作路线问题。

作品的主题本应是作家在生活体验中逐步形成的,现在却是写作班的领导人根据上面的政治动向来决定,这就叫作主题先行,也就是先确定主题,再去收集材料,写出作品来;而形势一变,主题又会产生变化。这种配合政治任务,图解政治口号的作品,虽然能够获得表扬,甚至会产生一时的轰动效应,但却没有艺术的生命力。这是走上了艺术的歧途。

这条错误的创作路线,自然也不是从“文革”时期开始的,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或早些时候就开始了。周扬提出“写政策”,就是要用政策来统制创作主题,而各种培训班、讲习所,也就是《朝霞》创作学习班的前身,其目的是要建立起一支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创作队伍。后来又有“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所谓“三结合”创作方法,就是要作家去图解领导思想。但是这种根据别人指定的主题来编造作品的做法,其实并不符合创作规律,鲁迅早就说过:“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

现在,当初写作班子笔下所牵涉到的政治风云已经远去,我也无意与哪一位执笔者结算旧账,只是觉得写作班子的写作模式有碍于我国学术事业的发展,有碍于文化界的理论创造,因此需要重新加以审视。

说起来,我与上海写作班子的关系也很密切。内子高玉蓉就是这个写作班子文学组的早期成员,丁学雷这个笔名就是她们几个人最先用起来的,后来虽然因为参加“四清”工作队而离开了写作班子,又因到黑龙江插队而离开了上海,但是一九七五年回沪之后,还是进入了写作班子系统的《朝霞》编辑部。我本人虽然没有进入这个写作班子,但也跟着当时的政治风潮写了些批判文章,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时,我还是积极的支持者,后来因为反对市革会以“反逆流”的名义镇压“炮打张春桥”的学生,而与上海写作班子分道扬镳,并且受到批斗,但那时也只是对他们紧跟张春桥感到不满,对于写作班子的运作方式却并没有产生怀疑。只是到“文革”结束后开始研究知识分子的道路问题时,才发觉这种运作方式的危害性,因此想从中总结一些经验教训,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摆脱依附思想,树立独立精神,大胆地进行自由创造。

(转载完。选自《书城》2014年第3期)